

山川·历史·人物

师 陀

I212/30

DE5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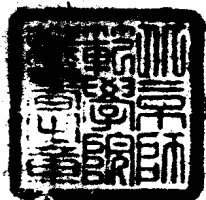
山川·历史·人物

师 陀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15474



上海文艺出版社

715474

内 容 提 要

这本集子共收集了十三篇散文。大多数摄取的都是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城市、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几朵普通的浪花。浪花尽管普通、平凡，但在作者的笔下却被描绘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犹如一幅幅色彩鲜艳的图画，看后使人得到启发，得到美的感受和情操的陶冶。一篇《哀鲁彦》则是一九四六年的旧作。

作者写的四篇历史故事和一个历史独幕喜剧，也附刊在集子后面。

山川·历史·人物

师 陀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5 字数 106,000

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册

书号：10078·3062 定价：0.56元

从我的旧笔记而想起的 及其他

(代 序)

这本小书的得以出版，我首先得感谢华国锋同志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只有在他们率领全国各族人民粉碎“四人帮”后，它才有和读者见面的机会。以《山川·历史·人物》作书名，并不是由于这篇小文写的如何特别好，而是因为这些东西发表时间不同，性质不同，用它作为书名，勉强可以概括它们的内容吧。

至于这些小文写作的经过，我曾在另一篇暂时还不准备发表的稿子里大体上都讲到过。这篇稿子的题目是《从我的旧笔记本而想起的》，写成于今年的一月八日。现在为省事起见，选择今天可以和读者见面的部分，节录如下。

“我手边放着八册旧的笔记本，是上海作家协会发还的‘抄家物资’。回想起十一年前，抄去的远远不止这些，连在‘牛棚’里被抄去的，前后总共有二十多册吧。那么它们是幸存者了。对于这些幸存者，我既珍惜，又厌恶。我所以珍惜，是因为它们能帮助我回忆，虽然断断续续，非常的不完整。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我深深感谢解放，是它挽救了我；是它使我的生活安定；是它使我有机会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投身各种运动，改造思想。作为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很艰难。我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学的很差劲；但是我总在学，总在走，总在努力的一步步向前，不是后退。这八册旧笔记本就留着我学习的足迹，或恰当的说，是足迹的一部分。它们也留着我的一部分日记。看了它们，我记起我曾经参加过‘土改’；我曾经去农村深入生活；我曾经出国访问……可是，我还记得我曾经参加过‘三反五反’，我曾经参加过私营工商业改造运动，我曾经去东北参观访问，那到底都是哪一年呢？我曾经下过工厂，那又是哪一年呢？我记不起来了。那些能帮助我记忆的笔记本没有还给我，就是我去农村生活的日记也是残缺不全，它们也许被随便处理了，更有一个可能，被送进造纸厂做‘还魂’纸去了。我所以

对它们厌恶，是因为它们常常触动我的创伤。孔夫子的思想在他那段历史上大概可以称为开倒车的人，他毕竟留下许多名言，其中之一曰：‘不迁怒，不二过。’我深知这个道理，不能怪我的笔记本，然而不知怎么的，我碰到它们，仍旧象摸到一把浓痰似的不舒服。这不舒服是有原因的，原来在发还给我的八册笔记本中，就有着没有写完的历史独幕喜剧《列禦寇》的草稿。为什么没有写完呢？我想了一想，忽然想起来了。那是一九六三年元旦，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号召‘大写十三年’以后，——也很可能是以前，总之，我因为身体有病，准备写几个春秋战国时期的小喜剧，美其名曰‘废物利用’。先写成《伐竹记》，发表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份的《上海文学》上。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在《解放日报》时期，原是专门捣鬼攻击以陈毅同志为首的上海市委的老右派。陈毅同志调到中央工作后，不知怎的忽然被市委新的领导人赏识，被提拔为文艺部长。人呢，也摇身一变，变出一副极‘左’的面孔。后来晋升市委候补书记，由候补书记而书记，官升的越高，面孔越‘左’。《伐竹记》发表后，不知怎么就惊动他老爷了，于是运用法术，命令上海作家协会召开大会，教我在大会上检讨。他既不肯指明剧本犯的错误，作协领导同志也许事前得到过

暗示，也许不曾得到过，又不敢违抗。真是‘瞎子摸象’，教人家从哪里讲起呢？由于不明白教我检讨的原因，我拒绝了，同时也很生气。因此，本来准备写的一系列春秋战国的小喜剧，到了这《列禦寇》再也写不下去，只好搁笔了。

“那么我又是为什么想写春秋战国期间的小喜剧的呢？

“话说起来很长很远。还是一九六〇年，正当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恶浪，特别是苏联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利用我们的暂时困难，又是撤退专家，又是撕毁协定和合同，又是逼债。我是热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我是坚信中国共产党不会垮台的。我很气忿。我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固然学的不好，甚至可以说学得很坏，但有两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的同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并对之深信不移。我于是带着刚写好的历史话剧《西门豹》到北京去开第三次文代会，想在会议期间征求意见，供日后进行修改。

“开完会已经是八月了。我到河南农村去。那时的河南农村，也正象全国一样，是重灾区，即使少数非灾区，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有饭大

家吃。为了和国际上修正主义分子的种种咒骂和污蔑针锋相对，我决心写一本书，全写河南的建设成就方面，不教他们快活。这么着连发表带没有发表的总共写了八、九篇吧，到了一九六一年上半年，一天到晚只感到头昏脑胀，一个字也写不出。过去我也去过农村，不管怎样劳累，总是睡得很好；现在却是有些反常，往往通宵不能入睡。我想我是病了。回到上海去医院一检查，方才知，得了极其严重的慢性病，约有大半年时间，连报纸都不能看。后来病渐渐好起来，再提起笔写河南建设的成就，写了许多开头，怎么也完不成篇。自己很生自己的气，但是已经淡忘了的，生气也没有法子。于是乎修改《西门豹》。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完成了第二稿。

“那么当初我又为什么要写话剧《西门豹》呢？说起来话也很远很长。大约是一九五八年，一位任上海某报副刊编辑的朋友知道我有一钉点历史知识，一定要我写为曹操翻案的文章。对于曹操，我一向钦佩，但并无研究。既然非写不可，那就写吧。写了几篇很不象样的东西，连自己也感到厌恶，心里着实苦的很。在写的中间，我想：一部《二十四史》可写的很多，何不写点自己有兴趣的？说到中国历史，我感兴趣的是春

秋战国。并不是因为它‘古’。史籍上记载下来的还有比它更‘古’的，譬如三皇五帝；而是因为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期，也就是说社会很不稳定，已经日薄西山的奴隶主拚命要保持自己的势力，奴隶和自由民竭力反对，二者的代言人展开争论——其实进步的一派是替新兴地主阶级说话的，于是乎形成诸子百家。我认为韩、赵、魏三家分晋是新兴地主阶级在中国范围内最早取得政权的表现。我认为西门豹治邺是一场奴隶主复辟与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伟大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同时我还反复学习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认为真老虎应该这样解释：对旧制度，新制度是革命者，是生气勃勃的先进者，是真老虎。所以西门豹一到邺，经过充分调查研究，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复辟势力。同时另一方面，他们对人民又是剥削者。我还认识到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都不可能彻底，当它们取得政权后，总是要保留一部分残留下来的旧制度。例如中国的少数地主，直到解放时还在他们经营的工矿业中保存着奴隶制，

至于家庭奴仆，那就更普遍了。因而，出身奴隶主的魏侯斯也不可能是彻底的革命派。他为了希图被周王(当时的奴隶主)封为诸侯，于夺得统治权后，很尊重儒家。他当然也很可能听信失败了奴隶主的谗言，以至于当西门豹完成了邺渠，并在漳河上建成十二闸后将他杀害，成为历史上的悲剧。我不取《淮南子》关于西门豹练兵的材料，它固然可以作为西门豹反复辟斗争的收场，却不足以反映当时阶级斗争的复杂形势，以及我对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都是不彻底的这个基本认识。

“也许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不写奴隶起义呢？不错，当时的书上的确有许多地方提到过‘盗’，《庄子》里就有关于‘盗跖’的记载，可能是寓言，然而先得有‘盗’，他老先生才制造得出‘盗跖’来。我们今天能理解古代必然以现代生活知识为基础。我没有在任何军队里生活过，军事知识就是《孙子兵法》之类古代留下的几部书，此外可以说等于零。光凭几部古书写不成历史古典题材的戏剧或小说。加上庄周和别的古书上留下的关于‘盗’或‘盗跖’的材料又太简略，不容从其他方面加以描写。秦以后历代农民起义的材料多了，打仗写不好，还可以借助其他方面，即尽管打仗写的公式化概念化，其他方

面可以写得比较生动活泼。然而第一，在我当时的身体条件下，没有力量收集并研究这些材料，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第二，从陈涉、吴广到李自成、太平天国都有人写过，并且写的很好，那时——不但那时，就是现在，我自认写不过他们；第三，一篇作品写的是否完整，决定于作者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历史作品决定于作者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如果作者事前就没有把它写完整的信心，那就无论如何也写不下去了。这么着就退而求其次，既然郭老可以写《蔡文姬》，我为什么不学学他，写普通的历史题材？我的学识、才能当然远不足和郭老相比，毛主席曾说过一个人能力有大小的话，作为后辈，向他学习总是可以的吧。这就是我写《西门豹》的由来，也是我后来写春秋战国的由来。附带提一句：在正式写话剧《西门豹》之前，我曾根据集拢起来的材料，写成短篇小说《西门豹的遭遇》，刊登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份的《上海文学》上，谁又想得到，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了一个罪名！

“其实我对春秋战国的知识也并不丰富，只是在那个大动荡大变化的时期，各种流派著书立说，或不著书立说，保守与革新，奢侈与节约，唯心与唯物，迷信与反迷信，虚妄与务实，避世与入世……真是五花八门，表演得淋漓尽致。我

认为可以写成许多小喜剧。

“既然要写喜剧，我首先想起的是《宴子春秋》，它里头有大量的足以构成喜剧的材料。那位愿以自己的身体为父亲赎罪的女子，她的勇气着实吸引着我；宴婴的清正滑稽也吸引着我；齐景公的昏庸迷信也使我感到可笑。写历史题材须以历史材料作依据，然后有所发挥，古为今用。这自然是我自己的看法，不包括别人。于是把《宴子春秋》找出来，把有关记载宴婴的书找出来，七拼八凑，这就写成了《伐竹记》。我写它的目的是反对大男人主义，反对迷信，反对拍马。谁又想得到，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了一种罪名！

“《伐竹记》发表后，不料上海戏剧学院一位教师，要我向编导班的同学去讲讲什么写喜剧的‘经验’和‘体会’。平常连喜剧大师莫里哀的大作都很少读，我想世界上喜剧作法应该很多，可惜我又是一本都不曾读过——况且即便读过，也不能算是自己的‘经验’和‘体会’，自己又只刚刚写了一个《伐竹记》，又哪里来的‘经验’和‘体会’可谈呢？推，又推不掉。真是‘打鸭子上架’。没有法子，到约定的时间，只好硬着头皮去了。走上讲台，实在窘的很，很懊恼过去不曾读喜剧作法。可是已经晚了。只得根据自己的

认识乱讲一通，什么喜剧是从社会生活中来的，不是人为的呀；什么只要社会上有迷信的人、落后的人、保守的人存在，就有喜剧呀。

“……

“再接着我继续重写《大马戏团》。《大马戏团》是上海沦陷期间，我为了吃饭，搞起来的一个话剧，演出的确曾‘哄动一时’，那是导演黄佐临同志和演员们的功劳。我靠他们也确实吃了一阵子，并接济过别人，可是由于汉奸伪币通货膨胀，仍旧经常挨饿。大约是一九六一年年底吧，黄佐临同志要演出‘十大传统剧目’，告诉我其中有这个戏。我表示要改：我不能让社会主义时代的观众再看那样一个充满了黑暗又毫无出路的戏。我把内容改为马戏团内部的阶级斗争。由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发出‘反攻大陆’的叫嚣，我把时间设想在抗战前国民党统治下面，通过马戏团老板马腾蛟，老骗子慕容天赐，大地主黄大少爷，从侧面暴露蒋政权勾结地主、恶霸、流氓——一切国内的渣滓，借以统治全国人民。马腾蛟不再是窝囊废，一上场就表现出他是名副其实的老板，他崇拜好莱坞明星，他看相翠宝。盖三省根据自己的经验，深怕一旦被抛弃，撮合把翠宝卖给地头蛇黄大少爷。马腾蛟由于黄大少爷是地方上的恶霸，不敢得罪，

只好勉强同意。我让小铤复活，教翠宝跟小铤逃走，以马戏团老板、慕容天赐、黄大少爷失败而告终。

“这个戏到我重写完前两幕的时候，因为有人反对——我想又是张春桥捣的鬼吧，上海人艺不能演出了。我决心把它写完。不能演出，好吧，写完它自己保存起来，时间可已经是一九六三年的春天了。

“写完《大马戏团》，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搞《蒋平阶诗稿系传》。蒋平阶的诗稿，我是从一家旧书店得到的，原来没有书名，没有作者的姓名，只从内容得知它是清初一位从事抗清活动的志士的作品。我不曾学写古体诗，但读过古体诗，觉得它们实在写的不赖。后来才从清初选本中查出它们的作者是蒋平阶。

“关于蒋平阶这个人，现在的我们的搞文学史的人恐怕很少知道了。本来么，这也难怪，除了清初选本中留下他的十几首诗，朱彝尊的《明词综》中留下他的一阕词，《学海类编》中留下他的一篇《东林始末》，《明季辽事丛刊》中留下他的一卷《毕少保公传》，以及他为倪元璐《儿易》写的一篇序外，生前虽曾著书百卷，死后已荡然无存。我感到清初文学史只让几个变节分子出风头，任其湮没，着实可惜。心里早就想着为他

做点什么，苦于没有时间。现在有了时间，于是每天跑上海图书馆，查地方志，抄下有关材料。这么着时作时停，到了一九六六年春天，终于完成，托友人交给出版社，才算松了一口气。

“现在回想起来，我没有做完的工作，只有《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到底是谁一件。《金瓶梅词话》要比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早一百多年，塞万提斯采用了许多古代罗马故事，《金瓶梅词话》却完全是个人创作，反映明末社会生活的小说。至于艺术成就之高，请看鲁迅先生对它的评价：‘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说〔上〕）。作为世界上个人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来讲，它在内容和艺术加工方面难免有许多缺点，但是它对天下后世的影响却很大，没有它的出现，尽管一百多年后的曹雪芹经历何等丰富，才华如何高超，是不可能写出象《红楼梦》那样伟大的杰作的。它使用许多北方的方言土语。从明末到解放后的四百多年间，语言或有变化，因为不曾有过大的人民迁移，估计不会太大。我认为从方言土语入手，再加上原作提供的材料以及当时其他各书的文

字记载，大体上可以确定它的作者。然而我仍旧是党的利益第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第一。虽然有人支持我搞，解放后是否需要再把它搞出来，我没有把握，工作做到一半，便自动放手了。

“一九六六年‘五·一六’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运动么，既然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审查干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检查干部的思想、行为、作风，我全力拥护。接着我就靠了边。再接着单位就来抄家，把原稿、剪报、信件一扫而空，全部抄去。运动么，既然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即便‘抄家’是否符合《宪法》，一直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我也全力拥护。我是‘生平不做亏心事，半夜叫门心不惊’。哪里想得到，上海文艺界——范围缩小一点，只说上海作家协会吧，在文化大革命中从来不曾贯彻执行过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恰恰相反，执行的是法西斯专政的反革命路线。‘资反路线’执行的也是张春桥路线，凡是写过历史、古典题材的，除了有地位的人加以保护外，一律向市委宣传部呈报你属于‘四类’。‘四人帮’的余党上台后那就更可怕了，它执行的是‘迫害主义’，对‘牛棚’里的‘牛’实行长期的残酷迫害和折磨。至于我在‘四人帮’统治时期如何长期被迫害，这里暂时不讲。我只讲一点，那就是‘四人帮’用他们自己捏造出

来的理由，胡说什么《伐竹记》是为了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更荒唐的是《西门豹的遭遇》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这些理由现在看起来很滑稽，那时候却是紧箍咒，令人哭笑不得。那时候是，凡是解放后所写的一切历史作品，除了农民起义的以外，都是‘借古讽今’。去年我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遇见《大闹天宫》的编导万籛鸣同志，问他这么一部反封建王权的好片子，为什么竟被扣压十多年，他说：‘四人帮’认为是攻击社会主义的，^①这样看来，非但历史题材不准写，连古典题材也不准写，凡是写了的，就得‘罪该万死’！

“在我的批斗会上，我说我解放前连国民党官办的报刊都不肯投稿；我说我为了不使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分子快活，一九六〇年曾有意识的专门写过几篇河南建设的稿子；我说我为了反击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曾于一九六二年重写《大马戏团》；我说我写《西门豹》目的在反映历史上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西门豹的遭遇》不过是根据当时收集到的材料写成的一个短篇。凡此种种，事实俱在，都足以证明我的

① 日前碰到动画片《大闹天宫》的一位合作者李克弱同志，他说《大闹天宫》之所以被扣押十年之久，原因是“四人帮”认为玉皇大帝是影射毛主席。